

西周青銅器研究中所謂「康宮問題」的甲子回眸

Retrospective Look at the So-Called “Kang Gong Question” in the Study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李明陽 (Li Mingyang) *

1962 年，唐蘭提出，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經常出現的「康宮」一詞指周康王的宗廟，故這些記載著在康宮中冊命、賞賜儀式的青銅器銘文作於昭王及其以後的時代。¹與此同時，唐蘭還論證了康昭宮、康穆宮等是依附在康宮周邊的其他周王宗廟，並據此繫聯起大量青銅器銘文，作為西周青銅器的斷代依據。

一般來說，青銅器的斷代通常採用兩種思路。其一是考古學方法，即依據青銅器器型、紋飾、字體等排出譜系，將待定的青銅器與之類比，例如「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王世民等即以此作為西周青銅器的斷代標準；²其二是憑藉銘文中提示的歷史人物、事件信息作出年代斷定，例如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中所倡導的「標準器法」。唐蘭提出的「康宮原則」雖然也倚重歷史信息，但他標舉的斷代依據（即宮室名稱）較為單一，所引發的爭議卻是始料未及的。例如唐蘭認為一些宮室的命名與周王的謚號有關，這直接牽涉到西周

前期是否存在昭穆制度和謚號制度；論域中最關鍵的青銅器作冊矢令彝（《銘圖》13548）³等究竟作於哪一王世，涉及周初王室與楚國的關係；個別銘文的異體字寫法牽涉到古文字學內容。總之，對這些器物的不同理解將影響對西周史前期的整體看法。

「康宮問題」這一論域自 1929 年羅振玉對令彝的考釋初次涉及後已近百年；自唐蘭正式提出「康宮原則」，也經過了一個甲子之久。其間，「康宮原則」贏得了一些學者的支持，如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時和「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都貫徹了這一理念；⁴但也有不少學者從各種角度提出質疑，使得不少青年歷史學者因「不置可否」而在研究中刻意迴避此說。

考慮到器型、紋飾、字體等要素作為「藝術要素」在時代、地域上發展的不平衡性，⁵關於青銅器的斷代依據，筆者傾向對青銅器銘文中涉及的歷史信息作出綜合、切實的考察，而唐先生的考慮和論證顯然仍有完善空間。

* 作者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本文係中國大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團隊項目「兩周金文所見周邊族群與諸夏交流融合資料綜合研究」階段性成果。

1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1: 15-48，以下簡稱爲「康宮問題」。經由「康宮問題」形成的青銅器斷代方法，被學界稱爲「康宮原則」。

2 參見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 本文所引青銅器銘文依據吳鎮烽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下文簡稱《銘圖》。作冊矢令彝，下文簡稱「令彝」。

4 參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92）。

5 可近似類比文學意象、文體、格律、用典等諸文學要素在不同時代、地域發展中呈現的不平衡性。

但作為一篇綜述，本文希望盡可能中立地呈現前人關於「康宮問題」爭論的內在複雜性，而不摻雜個人態度。

一、令彝銘文引起的討論

關於「康宮問題」的討論源自對令彝的考釋。此器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稱出土於河南，銘文提到了「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一句，引出關於器主身分和時代的爭議；而「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提到了「京宮」和「康宮」，尤其是康宮的性質和名字由來，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⁶

最早考釋令彝的是羅振玉。羅先生認為銘文中「周公」即周公旦後嗣為王卿士者，器主是此周公之子，並將京宮釋為「鎬京之宮」、「告武王」。⁷文章列舉了揚敦（今稱「揚簋」，《銘圖》05350）、訃攸從鼎（《銘圖》02483）、君夫敦（今稱「君夫簋」，《銘圖》05197）、頌敦（今稱「頌鼎」，《銘圖》02492）等提及「康宮」的現象，將康宮釋為「康廟」、「告康王」。此文由唐蘭抄錄發表於《商報》「文學週刊」第8期，隨後，唐蘭在該刊第9期（1929年12月3日）發表〈書羅蘊叔先生所著〈矢彝考釋〉後〉，同意羅先生對康宮的解釋，主張銘文中「王」指昭王，但提出矢令在一日之內器主不可能從洛邑趕至鎬京，據此反對羅先生將京宮釋為鎬京之宮。唐先生還列舉〈大雅·思齊〉等文獻認為，「京」原是周邑舊稱，後意指都邑，明公「用牲」的京宮在成周，是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之宮。

1930年，鮑鼎刊行《矢彝考釋質疑》，對羅振玉的考釋提出質疑，⁸例如針對「命矢告于周公宮」認為「天

子不應降尊而祭于諸侯之祖廟」；提出「明公」出自《後漢書》，「非古代稱謂則可斷言」；針對京、康二宮，鮑先生認為諸侯卿大夫只能助祭天子祖廟，而不能專祭，並對「用牲于王」涉及的禮制提出質疑，認為令彝是拼湊諸多語料形成的贗品，唐蘭隨即發表〈跋《矢彝考釋質疑》〉回應，⁹認為鮑先生受到羅振玉意見的干擾。

如果說唐蘭以舊學起家、尤其擅長古文字學研究，那麼郭沫若的青銅器研究則往往從銘文所涉的重要歷史人物入手，重視對宏觀史事的討論。幾乎同時，郭先生發表了對令彝的釋讀意見，¹⁰並在次年擴寫為長文〈令彝令簋與其他諸器物之綜合研究〉，¹¹明確把「明保」一詞釋作人稱，意指周公旦之子魯侯伯禽，並判斷令彝為成王時器，這使令彝銘文的斷代成為討論「康宮原則」的重要維度，甚至在後續的討論中頗有些喧賓奪主的意味。如果令彝早於康王，就必然面對羅先生、唐先生提出的「康宮」是否為「康王之廟」的問題。由於郭先生接受了王國維〈通簋跋〉中關於謚號制度晚出的看法，¹²並且曾撰寫〈謚法的起源〉加以申述，¹³因此不能認同「康」為康王謚號，故更為疏闊地將「康」、「京」解釋為「懿美之詞」。據悉，當時郭先生正在撰寫《兩周金文辭大系》並想邀唐先生作序，該文未與唐先生爭論，但從「說者均以為康王之廟」一語判斷，郭先生顯然看到了唐先生的文章。

吳其昌曾師從王國維，以金文考證西周史事，尤其關注金文中世族譜系的建構。1931年，吳先生撰文拓展了〈跋《矢彝考釋質疑》〉的看法，認為令彝作於昭王十年，「京」是西周王畿都邑之名，「鎬為西周一代之宗都，故稱宗周，則京師之名，自當指鎬無疑」，「鎬即

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影印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28。

7 羅振玉，〈矢彝考釋〉，《支那學》5:3（1929.10）。

8 鮑鼎先生該文獨立成書，未知其刊刻單位，為石印本。

9 唐蘭，〈跋《矢彝考釋質疑》〉，《商報》「文學週刊」21（1930年3月4日），收入《唐蘭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174-175。

10 參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291-301。按，該書最早為上海聯合書店於1930年出版。

11 參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影印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45-83。

12 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895-896。

13 參見郭沫若，《金文叢考》（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影印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201-226。

是京，而京又為周代之舊名，故鎬當立『京宮』，因此「京宮」是周代「袷禘列祖列宗之廟也」。¹⁴吳先生據京宮「為列祖列宗群王之廟」，而「康王一人之廟與之相衡，自非新立之廟、子嗣為王之時，決不如此」，認為昭宮、穆宮等在康宮中且為昭王、穆王等與康王的合廟。吳先生對令彝的斷代得到了馬敘倫的認同，馬先生列舉《竹書記年》記載成王命周平公治東都、鄭玄注《禮記·坊記》提到周平公即君陳等，認為「明」是美稱，而「保」是官職，明公是君陳，主張「周公旦既薨，而管蔡皆以或誅或貶，惟召公以同姓之尊，位宰宰而總百官，召公既薨，則周公之子繼之。」¹⁵隨後唐先生再次撰文駁斥吳先生不應採信《刀劍錄》昭王共有51年的說法，且認為「周公子明保」是周公旦的小兒子，應在昭王時代。¹⁶

1936年，溫廷敬就令彝、作冊矢令簋（下簡稱令簋，《銘圖》05352）銘文的內容、時代和釋義提出了不同看法：京宮之「京」即「大」，京宮是太廟，祭祀太王、王季、文王，康宮的「康」即「安」，康宮是武王死後取寧神之意的武王專廟，鎬京有康宮，成周康宮據鎬京仿建，與後來康王之宮有別。¹⁷顯然，這種解釋對唐蘭彼時正在醞釀中的「康宮原則」形成了潛在消解。

與郭沫若相似，陳夢家亦重視對金文所涉史實的全面研究，其遺著《西周銅器斷代》以人物和事件作為青銅器分組斷代的依據，挖掘銘文所涉西周重要史事和制度背景。陳先生曾兩次對令彝銘文作出考釋，觀點不盡相同，但都直接涉及對「康宮原則」有效性的討論。最初，陳先生疑明保為召公，釋「周公宮」為周地之公宮。¹⁸陳先生第二次考釋綜合器型、紋飾、字體等信息，尤其重視銘文內容的系聯，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¹⁹將令彝劃入成王時期明保諸器組，面對康宮性質問題，陳

先生主張宮與廟有所分別，宮、寢、室、家是生人居住的地方，在廟、宗、宗室等處供奉先祖之位；「王在」之語不是王在某地就是王在某宮，因此，「宮」、「大室」都成了生人生活的場所。這一解釋是對唐蘭觀點的全面否定，此後也遭到了唐先生的全面批判。

受陳先生影響，譚戒甫沿用令彝作於成王時代的觀點，對「京宮」、「康宮」提出了新的解釋：《呂氏春秋·古樂》「歸乃薦俘馘首於京大室」的「京大室」即《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的「周廟」，認為公劉開始立都時，建了京大室以供祭祀饗宴之用，稱為周廟，及洛邑告成，新建宗廟，才用京大室舊名改為京宮，裡面有大室；「康宮」之「康」通「窳」，《方言》釋為「空」，康宮窳宸空闊，即所謂「明堂」，康宮四周還圍繞著昭穆新烈四宮，各有大室。譚先生徵引《周禮·膳夫》「凡王之饋……膳用六牲」，特別強調「到京宮祭祀祖先」，但「『用牲于康宮』卻是對人說的」，「此次明保在康宮用牲，自然是在康宮裡面會宴」。²⁰這篇文章維護了郭先生和陳先生對令彝斷代的看法，只是譚先生也坦承自己並未看到唐蘭的論證。

二、相關議題的全面提出

在上述幾番討論之後，唐蘭逐漸形成了對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宗廟制度的整體看法，並在其長文〈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中全面提出。此文旨在論證「康宮」和康昭宮、康穆宮、康厲太室等是周康王和此後數代周王的宗廟，以此判斷相關銘刻載體的時代。

唐先生開篇即回答郭沫若、陳夢家提出的問題：令彝何以作於昭王而非成王時代，主張：首先，成王時期的公尹是召公奭和周公旦，周公旦死後代其位的是君

14 吳其昌，〈矢彝考釋〉，《燕京學報》9（1931）：1661-1732。

15 馬敘倫，〈令矢彝〉，《國學季刊》4:1（1934）：43-48。

16 唐蘭，〈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國學季刊》4:1（1934）：49-58。

17 溫廷敬，〈令彝令簋與其它諸器之重研〉，中山大學《史學專刊》1:2（1936）：339-349。

18 陳夢家，〈令彝新釋〉，《考古社刊》1936.4：27-39。

19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10（1955）：69-142。

20 譚戒甫，〈周初矢器銘文綜合研究〉，《武漢大學學報》1956.1：163-211。

陳，成王死後顧命者是召公奭和畢公，明公並非周公旦之子，而是周公旦之孫。其次，從器型和字體來看，令彝近似於師遽方簋（《銘圖》13544）等，符合康、昭時期的特徵。再次，令簋銘文中提及「王于伐楚伯在炎」，唐先生認為楚並非淮夷，成王曾攻打淮夷但沒有伐楚，周王室伐楚國是昭王時期的事，王姜是康王后妃、昭王之母；最後，叔卣（《銘圖》05113）銘文中「保」字字形符合康王以後的特徵。在此基礎上，唐先生從四個方面論證「康宮」是康王之廟。

其一，令彝中京宮和康宮對列。令彝中提到明保到成周，先「用牲于京宮」，後「用牲于康宮」，還「用牲于王」，可見京宮與康宮都在成周。京宮是周王的祖廟，其中「京」原本是地名、周國的舊號，京宮是祭祀太王等列祖的地方；京宮原本建在宗周，洛邑營建的時候「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京宮相當於宗宮，康宮相當於考宮。

其二，其他器物中關於「康宮」的記載說明為康王之廟。作為對郭沫若觀點的回應，唐蘭認為「於穆清廟」是用「於穆」形容清廟，除「清廟」外，關於「廟」，未見其他形容詞。其次，銘文中提到「成太室」、「成宮」、「康昭宮」、「穆太室」、「厲宮」分別是成王、昭王、穆王、厲王的宗廟，因此「康宮」是康王的宗廟。針對後來諸王宗廟何以依附於康宮，唐先生主張武王、成王都曾大量分封諸侯，到康王時土地被分封殆盡，康王以後的宗廟則是周王室自己的了，因此，周康王在西周宗法制度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其他文獻中談到的宮殿名稱。唐蘭認為傳世文獻中提到了「昭宮」、「武宮」、「平宮」、「桓宮」、「僖宮」等均是用王號或諸侯諡號放在宗廟前面表示專名。同時，召鼎銘文中（《銘圖》02515）「周穆王太室」之名源於共王元年周穆王剛死不久，不稱宮或廟；十五年趙曹鼎（《銘圖》02434）、師湯父鼎（《銘圖》02431）、師遽鼎（《銘圖》05236）等中提到的「周新宮」是恭王時期為周穆王立的廟；遷簋（《銘圖》05342）、虢季子白盤（《銘圖》14538）中提到的宣榭是只有楹柱

沒有圍牆的建築，用以射箭，相當於宗廟中的射廬。

其四，唐先生主張周代宗法制度中存在昭穆現象：太王是始祖，王季是昭、文王是穆，武王是昭、成王是穆，宗廟、塚墓和祭祀典禮分出昭穆次序；文王、武王在京宮裡，宣王時康宮裡也是五廟，分別是康宮、昭宮、穆宮、夷宮、厲宮；銘文中不見恭王、懿王、孝王，是因為這些已經是祧廟，被附入昭宮或穆宮裡去了，總之，昭穆制度支持康宮是康王之廟，昭、穆兩廟分別為昭王、穆王之廟的結論。

針對陳夢家提出的「宮、廟有別」，唐蘭也有所反饋。陳夢家的依據在於《周易·繫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說文》「宮，室也」；《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等等。唐蘭徵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列舉《詩》〈采芣〉、〈雲漢〉、《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儀禮·公食禮》等文獻所作的「宗廟稱宮」解釋，以回應陳夢家提出的「宮室、寢廟是對立的」說法。唐蘭承認「宮」與「寢廟」確實有別，宮是總名，是整所房子，外面有圍牆圍起來；廟和寢都在宮內；宗廟是從生人所居住的宮室轉化過來的，但堅稱康宮、康昭宮等都是宗廟而非居室。

三、多維度論證的開展

繼1974年強家村和1976年莊白窖藏出土青銅器公布後，劉啟益和李學勤相繼撰文通過釐清家族窖藏人物輩分關係並對比其他器物，為西周早期、中期青銅器劃定界限。

劉啟益根據作冊鬲卣（《銘圖》13320）、遣卣（《銘圖》13311）和作冊折方彝（《銘圖》13542）都提到了「王在序」，且作冊折方彝與遣卣字體、紋飾相同，應屬同一時代器物，並據此推論：如果作冊折是成王時人，跨越康王、昭王、穆王三代，其孫史牆不可能活到恭王時期；作冊折的祖父是列祖，列祖在武王滅商後來見武王，武王享國年短，故列祖活到了成王時期，作冊折活動在康王後期、昭王前期，折方彝的時代為康王時期比較合適。²¹

21 劉啟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考古》1978.5: 314-317。

李學勤則以莊白窖藏商尊（《銘圖》11791）、商卣（《銘圖》13313）器型與折尊（《銘圖》11800）勾連，通過字體風格判斷折尊與壺簋（《銘圖》04585）、過伯簋（《銘圖》04771）、扶馭簋（《銘圖》04895）等同作於昭王時代；作冊折尊、作冊折方彝與令尊、令彝、令簋的內容和紋飾相同，為同一時代即昭王時期的器物。²²在判斷令彝屬昭王時器以後，李先生對銘文內容做出解釋。²³周公宮是周公寢殿；「京」取《爾雅》「太」之意，即周太廟，「康宮」是「康廟」，西周時期並無王城，「用牲于王」、「歸自王」的「王」指京宮、康宮兩座先王宗廟。李學勤此文強化了令彝斷代作為「康宮原則」核心衡量標準的重要地位。在這一時期，其他學者還從諸多角度介入「康宮問題」，並展開了豐富討論。

對「康宮原則」提出質疑的主要是趙光賢、何幼琦、杜勇等。

趙光賢關注令彝銘文中「明保」的身分。²⁴針對唐蘭「明保為周公旦之孫」和「康宮原則」提出如下質疑：第一，金文中「康宮」出現次數很多，但「成宮」很少，何以康王地位如此突出？唐先生主張「康王以後不再分封作為特為康王立廟的理由，實在令人費解」；第二，據唐先生「京宮」、「康宮」對舉的邏輯，「用牲于王」中的「王」當是昭王，因此令彝當為穆王時器，又與唐先生的其他看法相違背；第三，金文中的昭宮、穆宮、厲宮前何以冠「康」字，並在康王廟內，難以解釋；第四，金文中宮名有以人名、官名等和其他不知來源的命名方法，康宮未必就是康王之廟。

何幼琦支持令彝為成王時器，但認為把宮名和王號的耦合視為偶然是錯誤的，提出唐先生並沒有解釋「康

王之廟獨尊有什麼依據」，「每一位國王在位時，都不曾出現與其孫子王號同名的宮名」，「宮城內除了京宮，還建了一座宮室，當成王給它定名時，宮城上和宮室上懸掛的匾額，所題的都是『康宮』二字……後世諸王，又在宮城內陸陸續續建設了一些宮室，同康宮是平行的，決不是附屬於它」；「宣榭……是厲王為宣王修建的」。²⁵

杜勇延續趙光賢的觀點，認為唐蘭混淆了宗周的康宮和成周的康宮，並質疑西周五廟說並不成立，列舉師丞鐘（《銘圖》15350）、史牆盤（《銘圖》14541）等體現的西周諸侯國和高級貴族的五廟制度，天子至少遵循七廟制，文中還對提到康昭宮、康穆宮、康夷宮的銘文一一做了分析，認為都不構成康宮原則的積極證據。²⁶

「康宮原則」也贏得了不少支持，例如賈洪波、尹盛平等。賈洪波反對郭沫若提出的「懿美說」和「偶與王號相同說」，從器型學角度相信令簋與令彝年代應屬西周早期晚段，遵從唐蘭關於周、楚關係的判斷，通過「伐楚」與「王姜」判斷令彝記載為昭王時事；並從紋飾和器型角度判斷，旗鼎（《銘圖》02321）與鬲卣（《銘圖》13320）和鬲尊（《銘圖》11788）的王姜應是一個人，而與不壽簋（《銘圖》05008）並非同一個人。²⁷

尹盛平從都城設置和昭穆制度討論「康宮」的意涵，²⁸認為所謂「周」就是岐周，即文王時期周人的聚居地「岐」，周廟在宗周，京太室是京宮太廟，岐周有西周王室的兩個宗廟：太廟和康宮，岐周康宮中有「昭宮」、「穆宮」、「夷宮」和「刺宮」等，並主張令尊、令彝銘文中的康宮並不是康王死後昭王為其所建的廟，而是康王生前以其母親的名字在成周洛邑建造的宮室，因此岐周的「康宮」與成周的「康宮」性質不同。

22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等重要標尺〉，《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1: 29-36。

23 李學勤，〈令方尊、方彝新釋〉，《古文字研究》第1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18-226。

24 趙光賢，〈「明保」與「保」考辨〉，《中華文史論叢》34:1（1982）: 123-136。

25 何幼琦，〈論「康宮」〉，《西北大學學報》1985.2: 10-16。

26 參見杜勇、沈長雲，《金文斷代方法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7 賈洪波，〈論令彝銘文的年代與人物糾葛——兼略申唐蘭先生西周金文「康宮」說〉，《中國史研究》2003.1: 3-18。

28 尹盛平，〈西周的昭穆制度與金文中的「康宮」問題〉，宋鎮豪主編，《西周文明論集》（北京：朝華出版社，2004），頁83-92。在尹夏清、尹盛平共同署名新近發表的〈西周的「京宮」與「康宮」問題〉（《中國史研究》2020.1: 5-22）中上述觀點得到了繼承和申說，作者提出「京宮」是周王室位於豳地的寢宮，其中包括太廟和周廟，唐蘭關於「京宮」和「康宮」是宗廟的說法不對，但二者可作為青銅器的斷代標準。

歐美和日本學界深入參與「康宮問題」者甚少。提及「康宮問題」者，例如夏含夷在其名著《西周史料》中複述了唐蘭的看法，²⁹可見對唐先生之說堅信不疑。唯有華裔學者李峰撰著分析銘文中提到的宮室性質及與西周早期官僚機構，其中涉及令彝銘文提到的京宮、康宮等處所和卿史寮、里君等職官，並從紋飾、形制等角度論證了令彝、令簋為成康時器。³⁰隨後，羅泰撰寫書評，只是引用唐蘭的觀點對李峰之說提出質疑。³¹至於日本學者，如白川靜、松丸道雄、林巳奈夫等多僅就銘文逐篇考釋，筆者未見正面論證或回應「康宮問題」的專題文章。

新近，有學者試圖從宗廟制度等角度為「康宮問題」尋找突破口，例如王暉、王鵬、杜勇和蘇浩等學者。

王暉討論與康宮相關的西周宗廟制度，認為：郭沫若將周康昭宮、周康穆宮、周康刺宮等都釋為懿美之字確實有誤，但康宮非康王宗廟卻是對的，唐蘭主張這些宮為宗廟是對的，但在西周宗廟制度的建構中忽略了周廟，且以康王為核心的五廟說違反了宗法、宗廟制度。王教授依據令簋、何尊（《銘圖》11819）等銘文主張，「京宮」即「京宗」，「京」相當於籍貫，京宮中只有文王以前的宗廟，並沒有文王、武王、成王和以後的宗廟。³²

王鵬對康宮的空間布局問題做了清理，³³文章根據令彝證明成周有康宮，根據夾簋（《銘圖》05271）證明康宮還在周邑，兩個都邑同時有康宮，且都與康王有關。文章列舉了康宮大室、康廟、康寢、齊伯室，認為大室

是一座具有獨立門、中庭的獨立建築組群，康宮大室中所冊命的官員多是為王家處理地方事務的職官和小臣，與宗廟祭祀或戎事不相關。康廟、穆廟屬於「周王某廟」性質，這種建制排除了「昭穆兩分」的「合廟」空間構型。康寢位於康宮之內，並非由「家宗人」職守的「前廟後寢」的廟寢。齊伯室見於敵簋蓋（《銘圖》05182），明確位於康宮內，證明康宮是含有多個不同小型宮室建築的大型宮室建築群，而非「天子五廟」型制的宗廟。

同年6月，杜勇依據新出土的曾公暉編鐘銘文中器主追溯其高祖佐佑文王武王，「王格我于康宮」，推斷康宮從成王時期始建，並非單一的王室宗廟，³⁴質疑「康宮」性質；陳民鎮撰文回應，主張曾公銘文具有追述性質，內容有拼湊痕跡，不能視同周初原始記載，不足以動搖「康宮原則」；³⁵在該學報的同一版，蘇浩判斷魯侯簋（《銘圖》04955）為成王時器，明公與伯禽同輩，關聯令彝銘文中的「康宮」，得出了與杜勇一致的看法。³⁶

2022年，即唐蘭〈康宮問題〉發表整整60周年，圍繞這一議題又形成了一個探討高峰。杜勇、王凱發表筆談主張唐蘭、郭沫若的意見是根本對立的，沒有折中調和的餘地，從核心證據的有效性（宗宮或康宮所祭為誰、作冊矢令與作冊大的關係、曾公暉編鐘銘文等）、直接證據的周延性（伐楚的時間、伯懋父的身分等）、輔助證據的相對性（器型紋飾、字體書風、文辭格制等）綜合判斷，贊成郭沫若、陳夢家的看法。³⁷緊臨其後的

29 Edward L.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93-216.

30 Li Feng,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文譯本參見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與國家》（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50-58。

31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Review: Li Feng,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第1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252-277。李峰的回應參見 Li Feng, "Method, Logic, and the Debate about Western Zhou Government: A Reply to Lotar von Falkenhausen," *Frontier History in China* 12:3 (2017): 485-507；〈令方彝、令方尊及新出土曾公暉編鐘所見「康宮」年代質疑〉，李峰、施勁松主編，《張長壽、陳公柔先生紀念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22），頁355-372。

32 王暉，〈西周金文「京宮」「周廟」「康宮」考辨〉，《中華文化論壇》2019.2: 33-49。

33 王鵬，〈金文「康宮」問題空間研究試探〉，賈珺主編，《建築史》第44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9），頁1-11。

34 杜勇，〈曾公編鐘破解康宮難題〉，《中國社會科學報》1942期（2020年6月8日），第9版。

35 陳民鎮，〈曾公求編鐘並未挑戰康宮原則〉，《中國社會科學報》2156期（2021年4月28日），第9版。

36 蘇浩，〈魯侯簋年代與「康宮」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156期（2021年4月28日），第9版。

37 杜勇、王凱，〈康宮年代問題的方法論檢討〉，《中國史研究動態》2022.3: 44-48。

一篇筆談，韓巍則提出針鋒相對的主張，認為王號是「生稱」抑或「死諡」、金文中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年代、銘文中大量出現同名現象等，都是學界眾說紛紜、沒有定論的，學者往往受制於對銘文的不同理解，帶有推測成分，不免主觀臆斷，而「康宮說」得到了扶風莊白一號銅器窖藏、琉璃河燕國墓地、寶雞強氏墓地、北趙晉侯墓地、絳縣橫水、翼城大河口、寶雞石鼓山、隴州葉家山等西周青銅器群出土和研究的驗證。尤其對曾公卣編鐘銘文，韓巍主張，從葉家山墓地的考古發現來看，將曾國始封時間推遲到昭王時或認為該墓地存在先後兩個不同族姓的曾國都難以自圓其說，且西周早期未見「尹氏」之官，故該器並非實錄，摻雜著春秋時期對西周冊命儀式的想像，不可作為「康宮原則」的證據。³⁸

《中國社會科學報》「考古學」版也積極推動有關「康宮問題」的討論。首先是劉樹滿重新梳理前人糾纏難解的作冊大與作冊令關係問題，認為令方彝銘文中的「父丁」就是作冊大，作冊大鼎銘文中「祖丁」是作冊大的祖父，也就是作冊令的曾祖父，作冊令是作冊大的兒子，作冊大可能任職于康王晚年，其子作冊令可能任職于康王晚年或昭王時期。³⁹此說實際上支持了唐蘭先生關於令彝的時代斷定。

隨後張懋鎔與沈長雲圍繞新出義方彝和義尊與作冊令器的時代關係展開討論。沈長雲、杜勇 2002 年曾撰文主張弧壁方彝在商代晚期就存在，令彝正是這種弧壁方彝的傳承，所以年代不可能晚到昭王時期。⁴⁰張教授針對此說提出，從正視圖來看婦好偶方彝的腹壁沒有絲毫弧度，義方彝作於武王時期、是年代最早的弧壁方彝，其整體形態、腹壁、圈足、紋飾、書體與令彝差別

較大，故令彝時代較晚。⁴¹沈長雲反對此說，認為義方彝不是周武王器物，從其 45 度視角完整圖像可以看出，義方彝和令彝大體屬於同一類型，器蓋與器身均呈弧狀，圈足下有淺台，並有八條扉棱，二器相似度較高，相差不會兩個王世以上。⁴²此後，兩位教授又往來討論，⁴³然所申理據相同，在此不做重複。

如果說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的兩篇文章是基於邏輯和方法不同的討論，那麼張、沈二位教授爭論的有趣之處，在於二人都是從器型學角度對義方彝和令彝做考古形制分類，且每篇文章都發布了大量清晰圖片。可惜二人對「相似」「不相似」、「弧壁」「非弧壁」的認定猶有如此大的差別，遑論主要依據經驗和器型學排譜方法估定義方彝和令方彝二器的時代差距是否有效了，這正可以作為對杜勇與韓巍關於邏輯與方法的爭論的一個典型比照。

四、簡要的總結

上文綜述了前輩學者關於「康宮問題」的討論。不僅唐蘭，彼時，郭沫若、陳夢家、吳其昌等也正值盛年，學術風格恰在確立過程中，「康宮問題」正是檢驗中國考古學、先秦史兩個新生現代學科的重要契機。只可惜此後突如其來的局勢變化，阻礙了原本可以暢所欲言的學術爭鳴，甚至陳夢家、唐蘭都沒能完成未竟的學術著作而過早辭世。

總體而言，以西周時期宮廟的命名原則考訂青銅器製作時代，並非唐蘭首創。⁴⁴但唐先生提出這個重要問題，並做了系統討論，為相關研究的正式開展提供了重要契機。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康宮原則」不同於

38 韓巍，〈今天的銅器斷代研究本質上是考古學研究——兼論新材料能否挑戰「康宮說」〉，《中國史研究動態》2022.3: 49-53。

39 劉樹滿，〈再論令方彝為西周昭王銅器〉，《中國社會科學報》2364 期（2022 年 6 月 10 日），第 6 版。

40 沈長雲、杜勇：〈關於弧壁方彝的分期斷代問題〉，《文物》2002.8:61-62。

41 張懋鎔，〈新出義方彝和義尊的年代學意義〉，《中國社會科學報》2382 期（2022 年 4 月 7 日），第 6 版。

42 沈長雲，〈也談義方彝和令方彝的年代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433 期（2022 年 6 月 23 日），第 4 版。

43 張懋鎔，〈再談義方彝和令方彝的年代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532 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第 4 版；沈長雲，〈再論有關令方彝年代等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576 期（2023 年 1 月 19 日），第 4 版。

44 較之更早的，如莫非斯，〈西周銅器中之宮廟及由之而考訂其年代〉，《考古社刊》6（1937）：87-135。

其他任何青銅器斷代依據之處，在於其結論至多只能證明「某器的製作不早於某王時期」，即使做這樣一個段限，仍面臨巨大的論證風險。因此數十年的努力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循環：原本寄希望作為衡量尺度的依據，卻成為需要綜合多重方法共同破解的疑難，何況不少學者的研究已經陷入哥白尼革命之前，關於地球軌道所謂「圓上加圓」的修正困境。

前人眾說紛紜的地方，恰是我輩出發的起點。還原西周宗廟制度，為考察西周史事提供參照，基礎在於論證康宮和其他宮室的性質，這需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其一，「康」、「昭」、「穆」等為周王的諡號，而且宮室處所的名稱確實源於周王諡號；其二，唐蘭依據金文材料構擬出的宗廟制度，符合傳世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其三，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未見以後世周王命名的宗廟現象。因此，儘管唐先生之說得到了不少學者的採納，但只要細審「康宮原則」的支撐論據就會發現，滿足上述每個條件都疑案重重：

作為周公制禮作樂的重要成果，諡號制度雖有《逸周書·諡法解》記載，⁴⁵ 卻遭受著來自王國維首倡的「時王生稱」說形成的較大衝擊，這也是金文斷代方法的重要爭論主題；同時，前輩學者關於康宮之「康」又提出過「康王」、「安」、「宸宸空闊」、地名等多種釋義，「京」曾被釋為地名、「宗」、「大」等，說到底，還是懿美之辭或周王諡號兩派意見的紛爭。同時，令彝銘文中提到的「周公宮」亦有周地之公宮、周公宗廟和周公宗廟三種解釋，即「宮」的性質—陳夢家的「生人居所」說與唐蘭的「先王宗廟」說也各有信奉者。可見「康宮即康王之廟」未必是堅確不移的定論，需要謹慎討論。

宗廟建制也是歷來經學家和史學家莫衷一是的重

點，禮書記載的天子五廟說和七廟說，究竟是否實行、西周早期究竟採取五廟還是七廟、抑或還有其他可能，文獻中還記載了遷廟、毀廟制度，這些制度有沒有落實過，都是先秦史學界亟待解釋的疑難。按照唐蘭的構擬，西周多位先王宗廟依附於康王宗廟，在禮制上是否合理、在考古上是否可靠，這樣的建築是怎樣的結構，包括京宮、康宮與周廟的關係，亦是有待深入解答的問題。與此同時，金文中經常出現的周、宗周、成周各自存在先王宗廟，有學者提出康宮不只在成周，還在宗周。不同都城的宗廟設置有怎樣的制度沿革，這不只是判斷「康宮原則」是否有效的關鍵，也是我們認識古代都城制度的核心關切。

年代學本是「康宮原則」的最終旨歸，爭議卻最為顯著。最典型的是令彝和令簋，議者或持成王說或持昭王說，亦有折中為康王時代和穆王時代者。唐蘭在論證令彝銘文時，又牽涉王姜和昭王伐楚等政治事件。由於對令彝銘文的理解不同，學界對文中所記史事及其折射出的冊命、祭祀制度和金文辭例也有爭議。不僅令彝和令簋，像魯侯簋、膳夫克器（簋、盃、盤）和曾公球編鐘的斷代和內容也被認為與康宮原則抵觸，如果依照何幼琦計算的曆日表，則有更多器物成為反例。

如今，關於「康宮問題」的討論既有部分器物支持，也有部分銘文和史事記載提出挑戰。以青銅器銘文中提到的地點或許與王世關聯進行斷代的方法，一定存在某種關係，但相關基礎研究缺少必要共識。未來的工作，有必要分清哪些是先置約束因素，哪些可以作為檢驗條件，而哪些則只能作為「康宮問題」解決後的衍生認識。總之，唐蘭以及包括郭沫若、陳夢家等當時的認識及其論證過程，有待未來學者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45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618-707。